

羅香林論學書札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編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羅香林論學書札

賴煥昌署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編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羅香林論學書札 /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編。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218 - 05857 - 3

I. 羅… II. ①廣…②香… III. 羅香林—論學書札
IV. K825.8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87410 號

封面題字	賴昌恬
責任編輯	柏 峰
裝幀設計	張力平
責任技編	黎碧霞
出版發行	廣東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汾江印刷廠有限公司
開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 張	43.375
插 頁	2
字 數	214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 - 7 - 218 - 05857 - 3
定 價	198.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出版社(020-83795749)聯系調換。

【出版社網址：<http://www.gdpqh.com> 電子郵箱：sales@gdpqh.com

圖書營銷中心：020-37579604 37579695】



羅香林先生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羅香林先生與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全體館員合影

緣起

李昭醇

羅香林先生為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廣東傑出鄉賢，他也是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可敬的一位前輩館長。二〇〇六年適逢羅香林先生誕辰一百週年，在香港大學馬楚堅先生的牽頭和幫助下，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決定將羅香林先生留在港大的書信選輯出版，以紀念這位對學術文化、對圖書館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學者。

羅香林先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任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前身之一）館長，任職期間，他積極革新完善館務，在藏書建設、專業培訓、社會服務以及搶救保護文獻等方面做出巨大努力。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羅香林作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的重要成員，為廣東全省圖書文獻的收復保存及整理做出重要貢獻。羅香林先生對於社會文化事業那種精湛的專業素養和高度責任心，永遠值得圖書館人學習。

羅香林先生為一代史學大家，他著作等身，交遊甚廣，去世後，他的家人將其著作及信札全部贈與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永久收藏。羅香林先生往來信札多達二千八百餘通，信札作者中不乏著名學者、社會名流，其手墨真迹無疑具有極重要的史料價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作為廣東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公共圖書館，長期以來一直積極致力於廣東文獻的徵集、整理和研宄，羅香林為廣東現代名人，選編他的書信資料乃是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義不容辭的責任，誠願專業人士和普通讀者都能從這本書札集中獲益。

感謝香港大學圖書館總館館長彭仁賢博士、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尹耀全博士慷慨玉成此書計劃；香港大學中文系馬楚堅博士係羅香林先生高足，既慕先師高德，亦本傳揚文化之責，欣然接受邀請主理本書編輯工作。本書從策劃聯絡到編輯出版，前後歷時一年多。本書編輯工作啓動之時，正值馮平山圖書館建館七十五週年，而本書完成之際，又逢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建館九十五週年，兩家圖書館合作編成此書，既是對羅香林先生百年誕辰的良好紀念，也是兩家圖書館館慶的很好慶賀，可謂一舉而三功。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日

序

馬楚堅

士之所以能自見於時者，曰文章、曰學問、曰品格，而要以三者兼顧為難，尤難於時艱之際。吾粵乙堂羅香林元一先生（一九〇六至一九七八）^①，早歲以《粵東之風》諸作膺譽於清華、燕京；既以客家學之研究而名益盛，隨之其唐史、中外交通、族譜學等之成就，古今獨步，創見至多，為中外學術界推為大學者、一代宗師，學界山斗也。

乙堂先生早年曾任中山大學校長室秘書長及史學系講師、副教授、教授至一九四九年移席香港止，為校而南中國之史學重鎮。中間因人事、世艱而嘗先後短期移席中央大學兼暨南大學；不二年，旋返長廣州中山圖書館^②，蓋重視圖書發展，以播植睿智，昌明學術，以奠國基，尤於風雲夕變之前也。故抵任即於館之設備革新、圖書管理更新培訓，圖書分類之更新及編碼改用漢字形位排檢法，圖書館閱覽之拓展及開放時間之延長，圖籍之徵捐量購，使館藏日新，大裨於一般讀者及專門研究，復組讀書會，編半月刊、學報，開場地供外借展覽文藝、集會講演文化學術。於是精神感召，文獻推廣流通、中外交流、收藏之開拓，及讀研之風氣日盛。迨日侵時，廣州淪陷前夕，對珍籍之搶救；復員後之倡重組全省圖書發展、流動車及學校借書之落實，廣東文獻委員會及其館之創立，前後創編、促成及輯佚多種學術刊物、叢書之問世，其貢獻之賢勞可謂突破前人，遠出儕輩。

迨其移旆香港，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中國歷史講席、講座教授、東方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及博物館、孔安道圖書館委員、珠海文史研究所所長。畢生以發揚中國學術，溝通中西文化為職志，雖課業、政務、交流繁劇，研著亦復未輟，而精神所致日富，專著竟達四十多種，論文則二百有餘，傳道毓秀之澤日廣，桃李滿天下，尤以推動拓展中國學術與西方漢學界之交流為使命，遂促使香港於五、六十年代以香港大學為中心而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之重鎮，而於中國學術之於世界文

① 朱倭率羅文諸子孫立，《羅公香林之墓》（香港九龍新界粉嶺崇謙堂墳場），墓碑左側刻曰：生於一九〇六年十月十九日終於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按：訪於羅文、羅康先生，知此乃據香港政府官方紀錄（身份證、死亡證）而定。

② 廣州市長曾養甫，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中山圖書館館長《委任狀》（《乙堂資料》，第三冊，第三十五項原件影印本。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

化上之地位，及於文獻交流，圖書度藏皆與有力焉。而先生通函復札之郵，或中外師友向先生通訊請益之書牘，雖片楮多寡不一，卻以此益見學人之謙以自牧，為學術生命而影響生命於無私處，此先生之以三不朽自見於時之明徵一也，以知乙堂先生為學術所景仰，蓋有如泰山北斗。適值先生百年誕辰^①，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九十五週年、馮平山圖書館七十五週歲之慶，兩館為誌紀念與文獻度藏及傳承以裨益於學術發展之至意，特此合作，將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珍藏羅先生之書札選編刊印以廣流通焉。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乙堂先生為學術盡瘁而安息，其後嗣將其所遺傳世之作數十種及所藏無數之書札交由馮圖特開『乙堂文庫』珍藏，歸類特藏，蓋多為先生及師友手稿、真蹟，且中有不少為已逝學者或當代名家，故藏品尤彌珍貴而以善本視之，不得借出與影印，今則為誌慶而選刊，知者聞之無不忻怡稱便而相告於途也。

先生書札，部分於生前自理或由夫人整理張貼，大部分由圖書館請人整編，曰《乙堂文存》、曰《史郵》、曰《羅香林教授所藏函牘》、曰《乙堂函牘》，惟《乙堂手稿》尚欠編理。就《乙堂函牘》言，凡一〇五冊，中皆為近代、當代中外著名學人、文教名流，或故舊門人約二二〇〇人之手札真蹟，共二八〇〇通強，合共九六〇〇紙；並以《文存》、《史郵》、《手稿》、《所藏函牘》、《省盧翰海》，札則逾萬紙，人則幾二五〇〇已，是知其交遊之廣，書札之富，於同儕言，可謂卓犖特出之一人矣。書札內容之年代，約起於一九三〇年，迄於一九七八年，而以抗戰前後至一九七〇年間為最富，此中適為中國近代史上風雲日亟，時世劇變之際；中西文化溝通，學術交流漸蒼萃向善境以肇睿思之期，由此批來往書札中，舉凡國族事、家事、天下事、相與論問切磋事、誠邀薦舉事、委託寄賞之評文論詩事、暢指時弊事、生活瑣事，學人研究動態事，文教際遇諸凡，無不於字里行間自然流露，在在可為大時代之見證，而於學人志業，學術史發展之轍，無不於其字裏行間皆可窺見之焉。世有欲為觀此之時代脈搏，焉可不取乎此也。惟內容之豐，數量之富，整編非易，益以部分時序錯置，前後通續頁顛倒，年月排次次序或有月日無年份，簽署或以名以字以號以齋而缺姓氏，文字或中或英，有一人逾百通，有一人數札者，篩選在在非易為也。職是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以倪俊明先生為首，馮平山圖書館以尹耀全博士為先導共組編選委員，並特聘香港大學中文系馬楚堅博士為主委，加以董理焉。

余以因緣際會，師承羅門，略識先生之遺風，稍窺其明鏡持心，泰嶽立身、青天應事、霽月待人之行誼，與故舊新知之一

① 據羅幼珊主編：《興寧東門羅氏族譜》（興寧書店印務公司承印，民國十六年秋月，鉛印本），卷一之八，《宗支譜·左八房冕公系·十七世至廿一世》，頁一，載先生『生清光緒三十年甲辰九月十一巳時』。但今一依墓碑所刻為的，以資統一及所以敬也。

二，既承特邀，即以擔簦孔廟旁，責無旁貸，當仁不讓而忘其拙，強允為董理考案，挑燈尋寶於書山，再三篩選，排比取論學剖疑難，問學求解惑者為先，次則文教為原則，且鑒於篇幅所限，例定先生所發，同一人不逾二通，致先生者則選與發同為限，皆序次編年，並盡其所知而將每札筆者或受信人出處略注，以供讀者互參。編次先選先生與人論學、談文教為主之書東存稿、謄文、已發復得者一〇一通為第一卷；次選先生居國內時期中外之前輩儕友所致函牘九十五通為第二卷；再次選先生移席香港時期中外學人、故舊門人所致函札七十五通為第三卷。雖所選非多，然其所具多方：一以寓三種紀念之意義；一以藉揆先生及致函者治學研究之心路歷程與學術貢獻；一以供治學好道者之參考，為近代學術文教史實予以時代真相之線索；一以反映先達後進相與論問切磋，傳導火薪之風範，為綿延中華文化所追求可久之道之所在者；一以存其真，按原手蹟、草稿、謄稿、譯稿複製書影，既可窺筆者墨蹟書藝於翰墨緣，且可欣賞其行款格式之所蘊，更可免手民之誤漏致變原文之意境於舛也。有此數者，世欲為觀其一二，吾知知者必覓此以覽之。是則，此當有其學術作用在，焉可不為也。

古哲有光大中華文化，勉人德具其心，為繼絕學開將來美志之訓，則本集之選刊，意亦在乎此，所選或不乏有可挈其量於時代、天地之真意，或可勵來者作為明燈以肇志啓睿而生使命自見於時而流於萬古，或可供共賞共享以感受達者之文章、學問與品格皎然，文化承肩之胸襟於寓目之際。尤深信關注民族命脉根本固在於自有文化傳統特色，致能世代屹然樹立自見於時，自見於天地者，莫不有同感於其中薪火相傳，志者承傳創新於歷代，積小滴匯源於萬古江河，使之一浪接一浪之延續活力賢勞所在焉。此種志業之行，吾以為可稱之曰『追求永久可大之道也』。是則，本集所選雖寡，而欲為觀近現代追求永久可大之道者，吾知必有取乎此也。至若乙堂先生之平生麗澤，可參見趙令揚先生所撰《香港史學家羅香林教授傳》暨附錄《羅香林伉儷對廣州中山圖書館發展及南中國文化之貢獻》、《羅香林先生對漢學橋樑之築道及其麗澤》也。又是書之編纂出版蒙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林銳先生、蔣志華研究員、郭超強先生、廣東人民出版社柏峰副編審多方幫助，謹致謝忱。編輯中獲顧問趙令揚教授之指導、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陳桂英、陳國蘭、張慕貞小姐及特藏部同寅、與中文系梁紹傑、楊文信博士之助、始藏其功、特此鳴謝！爰為述其編印之經過與意義如此，並為紀念以志忻賀之忱也。

是為序。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九日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特藏閱覽室

香港史學家羅香林教授傳

趙令揚

羅香林教授（一九〇六至一九七八）乃香港自一九五〇年以來最偉大史學家之一。先生字元一，號乙堂，廣東興寧縣新鎮人。父諱師楊，字幼山，善詩、古文辭及史學，著有《希山叢著》。母鄧氏，隆禮端淑，多識而能相夫教子。先生兄弟五人，身雖居幼，然於家學庭訓中已脫穎而出。及長，負笈上海，一九二六年入讀清華大學史學系，先後從名家陸懋德、孔繁霽、朱希祖、錢玄同、顧頡剛、陳寅恪、張星烺、梁啟超諸先生習中西歷史、民族史。一九三〇年升讀該校國學研究院，治唐史、百越源流史等專題。後更兼讀北平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受業於洪煊蓮教授。自後，畢生從事教育，並致力於學術研究。其治學嚴謹，勤於著述，專著已刊者六十餘種，發表論文近三百篇，部分未刊者本校馮平山圖書館特闢專架收藏。先生一生學術可分為兩個時期：一為國內時期，一為香港時期。先生本著「遍地皆學問，無處不文章」之精神，足跡所及，無時不造訪遺老學人、搜求資料，因是先生所得史料甚多，且層出不窮。憑其史學觸覺，連貫所考訂史料而綜合之，著述日富，新義迭出。

先生師出名門，稟承薪傳自多。僅以梁門史學為例，先生為學「求真」之志趣，實為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之升華。史學目的，任公主張「求真」、「求新」、「資鑒」。先生以之履行終身，致對任何問題，都能研究深邃，有所發明，求新於該時代，欲以其創見為資鑒，乃先生一生治學之精神。

治學之道，固重師承，方能有所循而出成果，故先生治學研史之門徑，稟承梁啟超、陳寅恪、朱希祖、洪業、顧頡剛諸老之教為主。然為學之道，亦貴於融會庭訓師教而後，別闢蹊徑，以求有所創獲於求真之基礎上。先生終生孜孜於斯道，故於香港大學執教十八年中，榮休後領終身名譽教授職，以至掌教珠海文史研究所期間，每出新著，除資料搜集無遺外，必有足補正史之缺憾，允成不朽之作。

甲：國內時期

先生出世於辛亥革命前夕，成長於軍閥割據、內憂外患頻仍之時代，故學成即有民族史處女作《廣東民族概論》刊於一九二九年，繼有《中國民族史》、《歷史之認識》等之出版。一九三二年獲燕京學社獎金考察華南民族，而有胥民體質之測驗及親赴東、北江考察客家文化之行，撰成《民族與民族研究》、《古代越族考》發表於一九三三年。自是其民族意識每貫於著述，欲有所籲，可謂道器相融矣。

又以研究民族史、客家文化而旁及方誌研究，一九三二年十月受知於鄒魯，禮聘為中山大學校長室機要秘書，兼廣東通誌館纂修，實即負責今《民國廣東通誌稿》之總幹事，全稿體例一出其手（該手稿現藏馮平山圖書館，誌稿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諸名家若朱希祖、溫丹銘、饒宗頤等先生參與斯誌之編修，延介之聘，先生與有力焉。一九三三年先生由秘書改為教席，仍兼誌館職，開講「方誌研究」課程，為中國大學始置此種涵蓋古今源流、全國發展史及歷代編誌特色，與運用地方誌資料來研究學術課程者，並發表《廣東通誌民族略族系篇》，可見其已將方誌、民族史研究融化為一，嗣後所發表之研究文章凡三十多篇。

先生自任職中山大學，數赴翠亨村考察孫中山先生故居，已具國父研究之腹稿。又訪海南少數民族，與海南學人陳月波等籌組「瓊崖黎苗文化協進會」，首以科學方法輔導嶺南學者研究民族問題。更於一九三三年底完成《客家研究導論》，該書探討華夏民族中客家之淵源、系統、五次大遷徙之原因及經過、客家人之分佈、語言特徵、文化特點等，是一本豐富之史料論述，遂為客家學之奠基作。此書雖為先生早年之作，於今視之，觀點、方法固有緣於時代之局限者，然一代宗師之氣象，已隱現其中。至其創闢衢道之功，更當為後世踵其先軌而別闢蹊徑者所銘記。

一九三四年九月，先生改就南京中央大學，專授中國民族史、隋唐五代史。次年與朱倓女士結婚。旋兼上海暨南大學教授，講授南洋史地及華僑史。又應正中書局之邀，編《高中本國史》三冊，後增益為《中國通史》二冊；又輯校《劉永福歷史草》。期間先生亦就地發掘不少隋唐、南洋史地及華僑史資料，為其後《唐代文化》等研究累存第一手資料。

一九三六年，廣東政歸中央，先生乃返廣州，出任市立中山圖書館館長，兼中山大學教授。隨創《書林半月刊》、《廣州學報》、《更生評論》，專刊學術文化、時評及政論文章，以促進嶺南研究學風及愛國風氣。並為中山圖書館搜集大量族譜及整理館藏善本、文獻。整理館藏期間，獲坤甸《蘭芳公司年冊》、林鳳超《坤甸歷史》抄本，知向無刻本，乃據其所累存南洋史地、華僑史料之一札一紙，歸納各相關典籍，經長期之比較、批判史料及求真推論，綜合成書，考出梅縣石扇人羅芳伯於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泛海抵西婆羅洲之坤甸，由採金而發展為蘭芳公司之成員，後助蘇丹平亂，為僑居者擁護，創立蘭芳大總制，羅氏更被推為首任民選總長，樹立民主之先聲。此民主共和政體，凡傳總長十人，歷一〇八年，至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始為荷蘭人所取代。先生為此特撰《西婆羅洲羅芳伯所建共和國考》，將華僑之開拓精神及先進思想表彰於世界，以補史闕。時英國劍橋大學中文教授崔維澤（D. Twichett）為撰書評，推為華僑史典範之作。

一九三八年先生因抗日戰爭，乃建議以館藏善本及重要文獻運桂，甫抵蒼梧，廣州即告失陷，文獻不墜，賴其卓見。其後先生即挈眷間關黔蜀，赴雲南，向遷地澄江之中山大學報到，沿途既訪尋古蹟金石、譜牒史料，復考察民族及風土人情，每有所得，即筆之於本。一九四〇年，中山大學由滇遷往粵北，先生隨之，足跡所及，仍孜孜不倦作訪查、考察，遂於桂林西山觀音峰發現唐高宗調露元年（六七九）阿閼佛造像及有關石刻，並合其他相關資料研索，考訂出唐代中印南海交通路線，及證明由印度循此海道傳入兩粵另一佛教宗教，

其佛教藝術與自西域陸路所傳入之風格不同，為世界學者所未知者，乃著《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出版於一九五八年。其中所論，皆為昔年常盈大定撰作《支那佛教史跡》時所經考察而未能知者。今世上論述中國南方佛教及藝術者，無不推重先生之著作為必備之經典。

先生避地桂林期間，時與學者討論史事，得知福建德化存《蒲氏家譜》，乃託賈援等抄寄，於是合其前所搜得《南海甘蕉蒲氏家譜》、崖縣《三亞港通村蒲氏簡譜》及有關資料加以研究，先成《蒲壽庚考》，後擴充為《蒲壽庚研究》，出版於一九五九年，考訂出蒲氏為回教徒，自西域入華，並其上世之遷移源流，與其家族之傳演系統，以補日人桑原鷺藏《蒲壽庚事跡考》之缺，並對蒲壽庚曾任宋代泉州提舉市舶使兼福建治海都制使，及其家族之活動凡與宋、元、明歷史發展有關係者，無不詳為論證。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於《東方學》第21期特撰書評，予以肯定。

一九四〇年末，先生於粵北乳源中山大學講學中，獲知紫金縣忠壩鄉孫桂香藏有《孫氏族譜》，託人覓得鈔本，經歸納各項史料，發現國父上世原居廣東紫金，以抗清事敗，遷居增城，尋遷香山，歷代以耕讀勵志，拒不仕清，因之乃撰《國父家世源流考》，揭出孫氏上世之歷代史跡，及其家世源流。

一九四二年，先生應邀國民政府出任學術專門委員，赴重慶公開講學，弘揚中華文化，凝眾志以禦日侮，乃以專題講論方式，進行學術研討。此研討分為五次進行：一、民族成長；二、社會發展；三、治亂因果；四、文化演進；五、人才消長。此數講遂為日後《中國民族史》著述藍圖（一九五四年出版）。隨之與李濟、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發起組織「中國史學會」，下置各屬會，作為全國學術研究之推動及指導組織。並於所屬「唐代文化研討會」作「唐代文化之認識」演講，於唐代貞觀之治、天可汗制度、佛教、文學、社會風氣均有所闡發，隨之刊為《唐代文化之研究》；後詢眾要求增補撰成《唐代文化史》（一九五五年出版）一書，每篇皆擲地有聲。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先生返廣州，出任省立文理學院（今華南師範大學前身）院長，暫借光孝寺為校址復課，創《文理學報》。先生於推動戰後學術文化建設工作之餘，時作實地考察，合各種史料，撰《唐代廣州光孝寺與中印交通之關係》（一九六〇年出版），將印度循海道傳入之經典、宗派、植物，一一加以說明。並將義淨諸僧侶經此赴印等史實，攝論宗之成立、發展經過，及其與禪宗南派及廣州所譯《涅槃經論》之關係，皆有深入之論證，發現良多。其中對《首楞嚴經》翻譯底蘊與訶子樹移植關係等問題之研究，尤為深遠。

乙：香港時期

一九四九年六月，先生辭卻一切職務，挈家移居香港，先後任教於文化專科學校（廣州文化大學分校）、廣大書院（廣州大學改設）、新亞書院等院校。一九五一年執教香港大學，一九六四年繼林仰山教授（professor F. S. Drake）任中文系主任，兼東方文化研究院院長。翌年除任中文系講座教授，仍兼系主任、院長，十一月研究院改組，改名為亞洲研究中心（Center of Asian Studies），乃兼亞洲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副主席，一九六七年獲臺北中華學術院頒授哲士榮銜。一九六八年任滿榮休。獲香港大學聘任為終身職之榮譽教授，

仍兼指導研究生工作。先生於榮休後為珠海書院創辦中國文史研究所，出任所長兼文學院院長，並曾三度當選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會長，又曾任基督教崇真會副會長及會長、清華同學會會長、香港徐福會顧問等，此外，先生屢獲推任其他社團首長諸職稱，多不勝數，不一詳列。

自一九四九年後，香港大學之中國研究及有關中國文史之課程，因政治變遷，國人漸處領導地位，先生尤為其中之表表者。先生首先開拓香港史課程，繼許地山先生之後，致力推動香港歷史及學術文化之研究，漸為世人所注意。一九五〇年五月始發表《香港人士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貢獻與影響》等論文，一九五九年六月與中文系門人莫秀馨等五人合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該書為香港史學術論著之奠基作，亦為先生於港大講授香港史及引導諸生進行考察調查、搜集文物之成果。一九六一年二月自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以紀念港大成立五十週年。上列兩部香港史論著，前者對香港海灣之作用、隸屬、歷代海上交通、香品、遷海、復界、文教、採珠、盜賊、民生等一八四二年之前問題逐一予以鉤沈考核，使香港前代史研究大放異彩。後者則專注於香港開埠後之歷史，對理雅各等翻譯中國經典之由來及教會關係，王韜在港活動與中國文化發展之關係，容闓及其所倡導之洋務、維新思想，何啟等創立西醫書院及其於醫術、科學上之貢獻，香港大學之發展及其影響等問題，均有論述，以證明香港在中西文化之匯合及其對海內外所產生之放射作用。此外，先生預主持發掘李鄭屋古墓，為香港考古揭開序幕，亦對李鄭屋村發現之漢墓與文物、舶寮州史前遺蹟、荃灣三百錢等作出鑒定與評價；又對香港新發現之南明永曆四年所造大炮作詳盡之考訂，對香港之打石史跡、藤業、宗教、宗親會、同鄉會、文學、漢學等之發展及其文化意義與影響，皆有論著；同時，亦對香港史上之重要人物作出研究，發為專題論文或傳狀，使香港歷史與學術文化更為世界學林所重視。先生以中山先生在港之活動為中心，集合相關史料，撰成《國父與歐美之友好》（一九五一年出版）、《國父的高明光大》（一九六五年出版）、《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一九六五年出版）。又就所得史料，研究香港大學出身之政要人物，成《傅秉常與近代中國》（一九七三年出版）及《梁誠的出使美國》（一九七七年出版）等書，均研究精湛，發人所未發，為研究近代史者不可不備之書。

一九五一年，先生於港大講授中外交通之餘，就西域南海二孔道之有關史料，略予爬梳，發現景教東傳事蹟，乃致力於有關景教文籍之搜羅、翻譯、排比及綜合研究，撰為《唐元二代之景教》（一九六六年出版），使唐、元兩代景教之源流、傳入及影響，大白於世。該書為日人石田幹之助教授等所推重，其中《系出波斯之李珣及其海藥本草》一章，尤為英儒李約瑟（Joseph Needham）所稱道。同時先生配合在港大之講課，整理前於廣州及今之於香港之考察調查及託友人訪諸星馬之真空教資料，撰《流行於贛閩粵及馬來亞之真空教》（一九六二年出版），對真空教之淵源流變，探析甚周，尤於該教與呂祖之關係，論述更為精邃。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先生於香港大學化學大樓，發表就任講座教授演講，題目為《中國族譜研究》。此為其學術研究之重大成果。先生自稱治中國史學，雖受近世史學潮流影響，然亦喜為中國民族之遷移及混合歷史之研究，深覺中國正史與方誌，其載述往往僅及於

朝政之實施，至於各民族之混合同化，則付闕如，故非以各姓族譜求之不可。此種研究之開拓，乃其自一九三〇年起即致力之重點，復於港大多年作集中研求，乃發展為歷史科學中之一專科，首次將其心得開講於香港大學，後乃於珠海文史研究所任期間，謀其大成，出版《中國族譜研究》，於一九七一年四月經亞洲研究中心推薦，得哈佛燕京學社補助，中國學社出版。該書於一九七二年榮獲中山學術文化獎，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槃先生特撰書評，推崇備至。已故史學家李璜先生亦於序先生《乙堂文存續編》為之大書特書云：

元一教授近年所從事之族譜學研究，是足為史學創一新興搜求與探討部門，當裨益史識匪淺。元一教授就任港大中文系講座時，即曾用此學作專題講演，其言有曰：「族譜為中國史籍之一類，與中國民族及文化之維繫，關係甚巨。顧近五十年來，中國歷史學界，則多已忽略及此。此則親於國內各大學，其史學課程，皆無涉及各族譜之研究者，各學者所發表之史學專著，亦甚少以各姓族譜研究為命題者……余治中國史學……則仍不能不於各姓之譜乘求之。」元一教授對於族譜之研究，既具此新眼光，立其志，樹其幟，而又歷得大姓名族譜牒，加以探求，發現新見不少，更於國際史學會會議席中，宣示斯學之研究方法，及其目標之於史學裨益所在。於是國際史學界為之矚目。元一之專家學養，其名此遠矣。

於此，可見先生「遍地皆學問，無處不文章」，即在本「求真」精神，處處留心史料、文物，無地不予詢訪，無時不予談論求證於師友、學生，經多年積堆、研求，融會創新，遂自成家派。其平日治學，充分利用族譜，進行專業研究，由是而著成《客家研究導論》、《國父家世源流考》、《太平天國洪天王家世考》、《傅秉常家世及其與香港大學之關係》、《蒲壽庚傳》等專書、論文，並將歷年搜集之客家各姓族譜數十種，編為《客家史料彙編》。本校所藏族譜，亦由其主持中文系系務時搜得，意欲為學術界闢一新土。先生之論著、論文及輯印文獻尚多，限於篇幅，略而不言。

現代治史，特別重視史料，從事於搜集、比較，而後歸納、批判、整理，才算「求真」。先生一生，步履所至，交遊談論之間，無時不隨機訪求資料、文物，考察、調查風土人情，每將所見所聞所得，筆之於札，以備將來之用。因是先生著作，世譽其善擇課題，良由其能充分利用所發掘之第一手資料。亦有論者以為先生淹通博瞻，歷年論著遍及今古，似有失於近世治史者所標榜之重專精，實不知先生有所博而約，其於中國民族史、隋唐史，可謂卓然大家。至其兼及古今者，實由家學厚殖，轉益多師，天資貫於其間，兼具才、學、識三長，故能博約隨心。尤為難得者，每抵一地，即發掘史料，究心於求真；所累積之史料既豐富，又以博學兼具敏慧法眼，故每能連貫考訂所得，揭出為人所忽略而又極為重要之史跡，以補史事之闕。亦因其每至一地，每考一事一物，均有所得，以至其地其事其物亦因先生之求真研究而為世所重，若廣東光孝寺、真空教、客家、廣西、桂林、香港等，不勝枚舉。

史學雖重求真、求新，然而治史者貴有己見。先生師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總論第一章《史的目的》，教人治史在「求真」、「求新」、「資鑒」。時人稱先生「遍地皆學問，無處不文章」者，即源出於此。因是他一生處處留心，時時搜究，循「求真」、益以己見而「求新」，故先生每成一篇一書，皆有所發現，有所創見。綜觀先生之專書、論文，約可分為以下各類：民族史、上古史、唐宋史、明

史、南明史、近代史、宗教、交通、香港史、族譜、文化史、民俗史。然先生之處女作即為民族史，其後亦以民族史為重點，及以民族主義輻射於所著各書各文中，稍為留心先生著述者，自可見諸其字裏行間。由是知先生乃一民族主義之史學家，其治史目的，即欲為中華民族之前途作資鑒，此亦其所以每抵一地，必以其平素所得資料，與該地之人與事結合，發為論著，意蓋在資鑒也。先生之道德、文章亦如其為學，實經師、人師合一，終生無私，培英毓秀如治史求真，不遺餘力，此人所共知。其執教影響最大，國內則中山大學、文理學院，從遊弟子學有所專而成名家者有朱傑勤、戴裔煊、關履權、王重民、黃福鑾、林天蔚等；香港則香港大學，所毓植人材最眾，若陳炳良、陳學霖、陳璋、陳福霖、梁文金、馬幼垣及本人等。晚年更創辦珠海文史研究所，將其於港大所推動課程及治學精神，再作進一步發展，侍遊者亦眾，學有所成者有郭永亮、梁天錫、李志剛、朱鴻林、蕭國健、馬楚堅等。先生一生，本基督精神愛國愛家，對學術從不苟且，對朋輩始終如一，對學生則時加照顧。先生逝去已二十八年，然其學格、學風仍為學人所景仰不已。

（作者係原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中文系主任、前中文系中國歷史講座教授，今香港大學資深榮譽教授。）

編例

- 一、本書選編羅香林論學書札共二七一通。
- 二、本書根據內容分成：卷首、羅香林先生歷年聘書選；第一卷、羅香林先生與中外學者書；第二卷、內地時期中外學者與羅香林先生書；第三卷、香港時期中外學者與羅香林先生書。各卷再按發函時間順序編排。
- 三、書末附《書札相關人物小傳》（以姓氏筆畫為序），以便讀者參考。

目錄

緣起

李昭醇 (一)

序

馬楚堅 (一)

香港史學家羅香林教授傳

趙令揚 (一)

編例

(一)

卷首 羅香林先生歷年聘書選

中山大學聘書(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 三

廣州市政府委任狀(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 四

中山大學聘書(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 五

香港大學聘書(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六

香港大學聘書(一九五二年八月六日) 七

香港大學聘書(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六日) 八

香港大學聘書(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九日) 九

第一卷 羅香林先生與中外學者書

致丘輯甫書(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三

復羅倬漢書(一九三〇年五月五日) 二〇

復羅則桓書(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九日) 二三

致鄒魯書(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五

致鄒魯書(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日) 二九

致英國皇家亞洲協會書(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三一

復岑仲勉書(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 三三

羅獻修八句管一榮壽大慶徵詩文啓(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三九

致英國皇家亞洲協會主席書(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 四六

復黃蔭普書(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四七

復陳漢標書(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 五一

募集蕭漢夫紀念基金啓(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五二

致陸丹林書(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 五四

致羅梓材書(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日) 五六

復羅卓英書(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五九

致蔣介石書(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 六三

致戴季陶書(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 七九

致亨廷頓書(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 八一

復孫科書(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 八二

致蔣介石書(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 九二

編輯《廣東文徵補篇》徵文啓(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 九六

致英國皇家亞洲協會書(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一〇六

致亨廷頓書(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一〇七

復陳承寬書(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 一〇八

致魯實先書(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 一〇九

致張其昀書(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 一一〇

復羅懷烈書(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四日) 一一三

旅港羅氏宗親會徵求會員啓(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 一一七

復陳孝威書(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 一二〇

復梁寒操書(一九五五年五月四日) 一二二